

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并按說明或在歷史學家指導下學習和理解民國

民國說明書

張程／著

【中文名稱】民國

【英文名稱】The Republic of China

【漢語拼音】Min Guo

【成分】軍閥，政客，革命者，文化人，商人，黑社會，底層人民……

【性狀】1911至1949年間的中國社會全景。

【藥理作用】通過歷史事實的全方位揭示，展現一個更加立體豐滿的民國社會，從而讓讀者產生一種身臨其境感，在思想上與其接近，由此獲得一次陶冶人心的精神之旅。

【適應癥】用于因對民國缺乏全方位了解而對其產生恐懼、排斥或是貶抑等態度的精神狀態。

【用法用量】閱讀。成人，一生1~5次。

【禁忌】

1. 對民國過敏者禁用。
2. 教科書思維肥大、重度歷史近視患者禁用。
3. 思想激烈者禁用。

【注意事項】

1. 思維功能不全者慎用。
2. 批判能力阻塞性疾患、批鬥功能亢進患者慎用。
3. 兒童使用請諮詢歷史老師或歷史學家。

【互相作用】

使用本書，請勿同時閱讀歷史教科書，以免造成氣管梗阻、思維紊亂、被老師罰站等狀況。

民國說明書

張程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说明书/张程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8-10186-8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社会史—中国—民国—通俗
读物 IV. ①K25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1523 号

民国说明书

张程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装帧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5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186-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关于说明的说明

民国是一段历时将近 40 年的历史时期,要在这薄薄的小册子中把这近 40 年的里里外外都翻个遍,即使是浮光掠影,也是超乎笔者能力之外的。好在这只不过是一册说明书,我们要做的是个引导性的说明工作,而非面面俱到的解读。无论是人物、社会还是思想领域,民国值得一书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了,即使是几十卷本的通史或是大辞典恐怕也无法穷尽。因此,笔者没有自不量力地试图挑战学识的极限,而是在这些领域挑选了一些例子做了示范性的讲解。它提供的,主要是一种全面认识民国的观念以及深入观察民国的方法。读者可以以这些范例为参照,继续阅读其他材料。要是读者不打算进一步深入了解,但通过这部小书,他也能对民国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如果说,民国的历史能促使人做一些思考,能让人重新体验祖辈们的青涩韶华,能帮助我们找回失落已久的激情,那本书则提供了进入这种状态的路径,循着这条路,读者可能会在民国这段历史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关于本说明书的说明对象——民国的一个概述是不可

缺少的。这是所有说明书都具备的要素。

—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响起的枪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是起义计划暴露、群龙无首状态下仓促的枪声。可就是这一声枪响,让清王朝土崩瓦解,这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清王朝的灭亡,或者说是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终结,不是一两声枪响的功劳,而是被中国人抛弃的结果。中国在近代的沉沦、从泱泱大国到令人宰割的巨大落差,几乎让全体中国人痛思原因。对比中外发展,当时的中国人思考的结论是:这一切都是君主专制惹的祸!到1911年枪声响起的时候,积累了强烈不满的人民闻风而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北洋新军集体倒戈,隆裕皇太后和宣统小皇帝不得不在1912年退位。

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想法太简单、太理想化了。把近代中国落后的所有罪责归咎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头上,尤其是“宪法未立”、“民权未伸”的头上,让大家忽视了许多其他问题。中国社会远比清末民初的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这种简单化的理想让民国一建立,就陷入了权威骤失、动荡不安的局面。

孙中山先生在起义成功后赶回国内,立即超越之前曾被考虑为候选人的袁世凯、黄兴、黎元洪等人,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总统。他的成功,取决于时人对西式民主共和的着迷,取决于人们对革命党人的崇敬和厚望。但是很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现中国的国情很复杂,能够推动西式民主共和的力量很薄弱。相反以袁世凯为首的传统政治力量,扎根中国实际,很强大。百日后,孙中山即让位于袁世凯。他感慨:“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不想一语成谶。从此,理想主义的西式政治家,孙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再也没有掌握中央实权。

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从君主专制体制中破壳而出,也知道君主专制制度积弊难返,对民主共和也抱有敬畏之心,多多少少也相信民主共和能解决中国的部分或全部问题。民主共和的架子在北京迅速搭建起来,西方也承认了民国。可是无论是北上的革命者还是掌权的传统官僚,谁都不知道民主在中国应该怎么运作。没有民主经验,没有民主精神,更没有民主的社会基础,以议会和选举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迅速恶化为一个个政坛笑话。先是总统袁世凯和总理唐绍仪就总统和内阁的权限纠纷不清,唐绍仪黯然去职;接着是原本能为各方接受的继任者陆征祥在国会亮相的时候,讲话罗嗦不当,被意气用事的议员们否决;发展到最后,阿猫阿狗都在国会里混,人们把国会当成了衙门。代议机关被官场黑缸染黑,选票可以公开买卖,议员们成了出入八大胡同的“猪仔”,连累整个民主共和制度威信扫地。

刚开始的时候,冯国璋因为被报纸称为“狗”愤而与记者对簿公堂,表明他还想按照新规则办事。民主共和降临中国,上起强权人物下至贩夫走卒始终不敢等闲处之。即便是曹锟贿选总统,起码也走完了所有程序,“照章办事”。多数军阀都“凑份子”出钱出力,阎锡山出了钱,冯玉祥出力张罗,说明民主制虽然幌子还在,但只剩下可怜的幌子了。于是,原来被掩盖住的质疑声开始响亮起来。西式民主共和,能救中国吗?

民主在出洋相,政府政绩乏善可称,列强欺辱日渐严重,百姓生活持续下降。民国初期退化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连清朝末期都不如。人们开始呼唤中国政治思想中“大一统”的观念,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中国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乱局,救国救民。“国家富强”逐渐发展为压倒一切的头号目标,超越了口头上的“自由民主”,实际上成了全社会的期望。

只要看看上海滩上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产生“追求富强、御辱救亡”的强烈意向,赞同上述观点。

诚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

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

袁世凯和民主共和制度“磨合”了几年后,把政局混乱、政令不通,归咎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一小撮人的鼓动下决心恢复帝制,建立强权统治,可以视作是“大一统”观念的回归,可惜帝制的“壳”已经臭了,不能用了。袁世凯最终遗臭万年。继起的各派军阀强人不像后人想象得那般不堪。他们几乎都出身贫寒,报救国之心年少入伍,掌权后也想舒展抱负救国济民,可惜谁都没找到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的钥匙。国民党经过自我改造后,希望以强大的党驱动强大的国家。可惜国民党先天不足,派系林立,腐败横行,始终没能真正统一中国。中间又有日本入侵,全民抗战。抗战期间,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国民政府权威陡然提升。又可惜国民党没能利用民众情绪,更没能解决内在问题,白白浪费了大好良机。

中国人民在一次次失望、生活水平窘迫、对发展前途迷茫无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这是一条统一中国为真正的共和国,建立强大的政府建设富强国家的道路。按照这个思路,1949年民国的覆灭和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和“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人从反对专制倾心民主共和,到对西式制度失望的过程中,欧美国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整个民国时期,欧美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是坚持维持和扩大在华特权利益,而这些利益日益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诟病的对象;第二是欧美始终不愿意一个强大、平等的中国的崛起。这就导致国内反欧美情绪在逐渐积累。清末和民国初年,倾慕西方、呼吁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不在少数。20世纪40年代,多数中国人转变为抨击西方,反对西方在华势力的存在。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几十年。

以上就是民国政治发展的概况。真实情况比文字的勾勒要丰富多彩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它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破碎和重生的时代,一个沉沦和奋起的时代。中国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走过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内战、抗战,走过种种思潮的冲击、沉沉的

心理落差、冲向美好蓝图的冲动和失败的委屈，日子过得艰难而刚强，最终走向了现代，走进了我们能够触摸的历史。

二

中国社会有权力泛滥的传统，但直到清朝中期，社会还保持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近代后尤其是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剧变，政府角色在整个社会中一枝独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代人们对国家富强的渴望超过了对自由、民主、宽容等的追求。国家的力量被过分强调，人们把富强的主要希望寄托到政府身上，而忽视了也许“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近代中国没有成长出制衡政府的力量。传统社会中，在官府和个人之间，还有一个强大的士绅阶层，包括有功名的读书人、退休或在籍的官员、少数读过书的地主或者富商等。遍布各地的士绅上传下达，在朝廷诸公和山野村夫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他们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组织者和赞助者，是乡间纠纷诉讼的调解者和主持者，是官府和百姓都信得过的人。士绅的力量相对独立，能够制衡官府。在现实中，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府，都重视本地士绅，遇到大事都找士绅们商量。此外，宗族也是一个制衡力量。但是，士绅也好，宗族也好，都在汹涌澎湃的近代变革浪潮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剧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传统士绅孕育和作为的土壤了。西方社会，除了个人和政府之外，还有独立的立法、司法、教会、媒体等力量。但这些力量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更谈不上制衡政府了。

这些因素加上泛权力的传统，民国时期政府力量不断壮大，社会的宽容度逐渐缩小，学界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被动或主动地在降低。这是近代变革给我最大的感觉。当然了，这场大变革的关键词除了政府权力，还有许多，比如“现代化”、“革命”、“转型”等等。

现代化可算是大变革的目标、方向。被西方列强震撼后，中国人

以现代西方为样板,改造自己,称为现代化。现代西方的确比中国要先进,比中国要强大,但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国际标准,我们又该以哪一国或者哪一类国家为参照物进行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显然也争议不断,并且影响到现在。

革命,相对于改良而言,是变革的剧烈形式。近代中国在沉沦,一度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变革不尽如人意,一度走进了死胡同,迫切追求光明的热血中国人按捺不住,用革命来推动社会前行。革命是否是近代变革的主流形式,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是否比改良更加有效?这些同样是争议问题。革命者在当时总是少数派,是孤寂的,但对他们个人和革命精神,后人应该永存敬佩和缅怀之心。

如今喜欢用“转型”来定义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大致意思是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传统形态变为与世界接轨的近代形态。对于这种转型是怎么产生的,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式,近代中国落后了挨打了,先被欺负然后求变求强;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是自发的转变,传统社会蕴含着转型的推动因子,推动旧社会蹒跚走向新形态。不管两种观点孰对孰错,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双方公认的。那就是近代中国变革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参照物。中国人对转型原因的探索,经历了从“华夷”到“中西”再到“新旧”的思想变化。这背后虽然贯穿着对实效的现实追求,但难掩救国图强的迫切愿望。

民国只是从近代开始的中国剧烈变革的一个阶段,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

如今,我们依然处于一个变革的环境中。

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了解我们走过的路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对历史的反思需要一个恰当的时间点,隔开整整100年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1—6 序：关于说明的说明

人 们

3—43 北洋军阀：新时代门槛上的迷茫者

44—64 革命者：变革时代的推手

65—80 鲁迅：不合时宜者的价值

社 会

83—123 选举：西方制度遭遇中国国情

124—152 江湖社会：灰色行业和地下秩序

153—168 十里洋场：上海的崛起和城市化问题

思 想

171—182 进化论：中国人的新信仰

183—209 大学：中国教育的变与不变

210—212 参考文献

213—214 后记：百年之后看民国



人

71

北洋军阀：新时代门槛上的迷茫者

民国历史纷繁复杂，人物和事件特别多，加上军阀混战，多个政权并存，旁观者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去阅读和观察。

我们不妨根据时间界线，把民国历史分为不同的时期，让复杂的历史清晰起来。大致上，民国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28年4月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是第一个时期，我们习惯把它称为北洋军阀或者北洋政府时期。从1928年4月到1949年是第二个时期，一般被称为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21年历史是民国史的“显学”，说得很多，大家知之也多。而北洋政府时期因为人事复杂，政局动荡，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一般读者如果没有专心研究过，都不太清楚其中的弯弯绕绕。通过观察各派军阀，我们大致能够梳理清楚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脉络，也能明了民国的第一个面相。

北洋军阀时期一共16年，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阶段：从1912年到1916年是袁世凯统治的4年；从1916年到1920年是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的4年；从1920年到1924年是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统治的4年；从1924年到1928年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

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的4年。每个阶段恰好都是4年。

如此划分，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在每个阶段开始时都有一段过渡时期，比如1912年袁世凯摄取政权的时候，存在着一年左右的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共同参与政治的过渡时期。而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在袁世凯死后也曾经有段时间和总统黎元洪分享政权，其间种种不和还导致了“府院之争”；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在1920年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一起排挤掉段祺瑞上台，他们和奉系有过一段合作时期；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又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已经下野的段祺瑞一起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府，他们三方存在着一个共同执政的时期。所以说四个阶段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北洋政府的体制也在变。前三个阶段基本上是正常的政府结构，有总统作为国家最高元首，有国会和内阁；第四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存在一个执政府，没有总统和国会，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为国家的最高元首。段祺瑞在1926年因为“三一八惨案”下台，张作霖粉墨登场。他干脆成立了一个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大元帥。因此存在着一个从总统到临时执政到军政府到大元帥这么一个过渡。时间划分和历史梗概，是枯燥的。但是它为我们认识下面鲜活的细节与历史主干，提供了标尺。

袁世凯为什么要当皇帝？

说到北洋军阀，必须从袁世凯说起。袁世凯不仅是北洋政府的缔造者，也是北洋各派军阀的缔造者，北洋各派军阀几乎都是从袁世凯那里分裂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很低，长期是一个白脸的形象。在评价最低的时候，袁世凯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他在河南的坟墓都被人给挖了，骨灰扬弃，现在袁世凯好像还剩下几根枯骨存放在河南安阳的博物馆里。

最近十几年来，也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对袁世凯的评价正面起来，他的形象得以上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袁世凯

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国家发展过程之中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袁世凯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器物文明和近代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管袁世凯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他身上有一个致命的污点是没有办法抹去的，那就是他在1916年悍然称帝，复辟帝制。每一个政治人物，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掌握了国家政权，那么他就有责任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找到正确的道路。但是，袁世凯非但没有去找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反而进行了复辟，开了历史倒车。这一点怎么说袁世凯都难辞其咎。



袁世凯

有人说袁世凯这么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袁世凯不开历史倒车、不复辟，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来看看袁世凯为什么要当皇帝。

袁世凯一共活了57岁，从1859年到1916年。我们说他是北洋政府的缔造者和民国初期多数军阀的源头，但实际上袁世凯生活在民国的时间只有4年，即从1912年到1916年。他57岁人生的前53年都生活在清朝。袁世凯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民国，可身体的绝大部分还留在清朝。这样一个横跨两个时代的人，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是传统的，是属于晚清的。

在晚清，袁世凯的活动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袁世凯走的是一条传统的中国人求官、做官、做事的路子。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人家。所谓的官宦人家主要是指他的叔祖袁甲三曾经做过封疆大吏，到他父辈的时候，家人只是清朝普通的中

级官员。家庭对袁世凯的期望值很高，希望他走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很遗憾，袁世凯读书的能力不强，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一辈子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多次科举落第以后，袁世凯主动放弃了这条路，利用家族的人脉关系和资源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袁家有个世交叫做吴长庆，吴长庆是淮军的重要将领，当时统帅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庆军驻扎在山东。袁世凯就是去投靠他。

吴长庆对远道而来的世侄很关照，留袁世凯在军队里面帮办营务。这里的营务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事务，袁世凯就相当于吴长庆的办公室主任。袁世凯读书不怎么样，但是办事能力很强，把庆军营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吴长庆的信任。后来吴长庆奉调朝鲜，平定朝鲜局势，就带着袁世凯去了。袁世凯在朝鲜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处置得当，崭露头角。于是，吴长庆回国的时候就留一半的军队在朝鲜由袁世凯统帅。袁世凯在之后数年时间里，在朝鲜既要应付朝鲜内部各政治派系的纷争，又要抵抗虎视眈眈的日本势力的覬覦和入侵。他手上的牌很少，背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但袁世凯把朝鲜局势控制得很好，并且成功遏制了日本势力的侵犯。他帮朝鲜国王按照西方的近代军法训练了一支新式陆军。这次训练的经验让袁世凯对西方近代军事有了了解。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军队一败涂地。清廷上下都认识到进行军事改革，必须建立一支新式陆军。那么新式陆军在哪建？由谁来负责呢？他们选择了天津的小站，这个负责人就选择了袁世凯。之前，袁世凯把自己的练兵心得写成了兵书，遍呈朝野达官显贵，希望他们能够引荐自己，如今终于得偿所愿。1895年，袁世凯来到了天津小站。从此，天津小站不仅是一个地名，也成了袁世凯的福地，成了北洋各派军阀的发源地。

在小站，袁世凯训练出了一支私家军。后人常常把袁世凯称为军阀，但是“军阀”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以他为始作俑者。湘军的曾国藩和淮军的李鸿章何尝不是军阀？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组织军队的。曾国藩组织军队主要靠血缘和地缘。他依靠亲朋好友以及同乡、同学来组织军队，比如他的一个同乡能招募到一个营的兵力，

他就委任这个同乡为营长；如果这个同乡能招募到一个团的兵力，他就委任这个同乡为团长。依此类推，湘军一层一层建立起来，官兵一级一级对上负责，最后所有人的权力和指挥都归到曾国藩的手中。这样曾国藩就组织了一支子弟兵，全军上下都要服从曾国藩的指挥。李鸿章的淮军也与之类似。但是，袁世凯组织的小站新军并不是按照血缘、地缘关系组织的。他在招募士兵的时候非常挑剔。袁世凯挑选士兵，主要看应征者长相是不是忠厚、个性是不是老实。如果一个人是出生于市民阶层并且油嘴滑舌，袁世凯肯定不用。另外，袁世凯对那些游手好闲、抽鸦片的也坚决斥退。所以，袁世凯重用的官兵都是像曹锟、张勋之类看起来傻傻的、有点肉的、五大三粗的人。



清末新军合影

如此标准保证了小站新军的素质。袁世凯的这种做法被后来的各派军阀所沿用。比如后来冯玉祥在招募军队的时候，就秉承两个标准：一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农村来的。二是让他把手伸出来看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如果应征者是手上长满长茧的农民，立刻录用；相